

中國十大名儒

中国文化名人评传丛书

黄修明 张 力 著

延边大学出版社



· 中国文化名人评传丛书 ·

中国十大名儒

舒大刚 吴绍钊 主编

1992 年 · 延吉

序

本书是中国儒学史上十位大师的评传，读者从中可以看出大师们的生平业绩、生活风采和学术思想，也可大致看出中国儒学史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历史阶段。

中国儒学，是在孔子学说基础上不断演变而成的，在其发展史上，大致可以分为六个时期，即先秦儒家学派时期、两汉经学时期、魏晋玄学时期、宋明理学时期、清代朴学时期和现代新儒学时期。

先秦儒家经历了形成、分化、合流三个阶段。春秋末年孔子创立儒家的阶段。孔子终生教学，相传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儒家团体；又删订《诗》《书》，修起《礼》《乐》，赞《易》，修《春秋》，为儒家制订了经典；还提出了“仁义礼”三位一体的学术思想，作为儒家的指导思想。从此，儒家学派作为有经典、有思想、有徒众的学术实体正式问世了。第二阶段从孔子死到战国前期，这时儒学阵容进一步扩大，《史记》说：“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儒林列传》）形成一个“游文于六艺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宗师仲尼”的庞大阵营，在诸侯各国影响至深。但这时儒家学派内部也产生了分化，出现了“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汉书·艺文志》）的局面。韩非更说：“孔、墨之后，儒分为八。”（《显学》）这时儒家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居于“显学”的地位，但与其他各家犹自平等相处，气氛较为民主。儒家八派中有“子思氏之儒”，“孟氏之儒”和“孙氏之儒”。子思为孔子之孙，孟氏即孟轲，学于子思之门人，传孔子“仁义”之学，为“思孟学派”。孙氏即荀子，相传他远绍子夏之绪，传孔子“礼乐”之学。孟、荀崛起于战国中后期，他们辟杨墨，攻异端，捍卫了儒学的显学地位，也促进了儒学由分到合的实现。因而孟、荀成了我国先秦时期的儒家代表人物。

两汉经学是儒家走向独尊的时期，也是儒学蜕变，成为御用学术的开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儒家以不合时宜，是古非今遭“焚书坑儒”之祸，转入低潮。汉初休养生息。崇尚“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儒学不绝若缕。直到汉武帝时，儒学才迎来希望的春天，开始其辉煌的事业。两汉经学分两个阶段，即两汉今文经学和东汉古文经学阶段。今古文经学，最初以经本文字的今（汉隶）古（战国古文）而得名，但他们的分歧远不止于此，而在治学风格、思想内容乃至经本的有无残全上，都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从经本上看，今文家以齐、鲁、韩三家《诗》、今文《尚书》、《仪礼》、《礼记》、《易》、《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为经典；古文家以毛《诗》、古文《尚书》、《周礼》、《逸

礼》、《易》、《春秋·左氏传》为经典。在相同的经典中，古文经比今文经内容齐全，文字可靠。从思想内容看，今文家以《王制》、《公羊传》为依据，所讲制度规模比较狭小；而古方家以《周礼》、《左传》为依据，制度弘大，内容丰富。从治学风格看，今文家力图发现五经中的“微言大义”，牵强比附，甚至与谶纬迷信相结合；古文家则重视经文本义的训诂，名物的考实，以质实纯正见长。今文经学盛行于西汉时期，它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董仲舒自“公羊学”而入五经，特别善于发挥“微言大义”。他又把儒学与阴阳、五行、名、法、方技结合起来，改造成适合西汉大一统形势和积极有为政治需要的学术，因而获得西汉统治者的特别赏识。也是他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而确立了儒学在中国思想界的统治地位。汉朝于中央政府设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用儒学造就士子和选拔人才，儒学与政治联姻，影响中国的政治、社会和学术生活。古文经学的大师很多，而以西汉末年的刘歆开期端。刘歆校书中秘，发现大批古文经书，请求立于学官，以广其流传。今文博士不愿古文经与自己方驾并驱，深闭固拒，刘歆遂移书让之，斥其“抱残守缺”，“是末师而非往古”；激起今文博士的反感。从此，双方各执一端，互相论难，这就是两汉时期的今古文之争。东汉时期，虽然只设今文博士，但古文经学却信徒日繁，大家辈出。贾逵、子融、许慎、郑玄，各领风骚。特别是郑玄，他遍注群经，杂糅今古，从而以集大成的姿态息歇了今古文之争。

魏晋玄学，是儒学向异教方面蜕变的时期。郑玄的经学，总结汉经学之功有余，而开辟新的视野不足。郑注三礼，融会今古，平实雅正；所注《周易》，却继承今文经学的象数学，大谈爻辰，陷于机祥。使圣人义理尽失，读者味若嚼蜡。于是，儒学转而寻求理论的思辨，魏晋玄学便顺理成章地产生了。玄学家们以《易》、《志》、《庆》为经典，号称“三玄”。他们毁弃名教，轻薄礼法，对传统的道德与经学，实为一大解脱。但援释道“虚”“无”以释儒典，窈渺虚无，玄之又玄，大异儒家“修齐治平”之旨。随着南北朝的对立，儒学又分为南学、北学、南学宗王弼、何晏的玄学，简洁而得其精华；北学守郑玄经注，繁芜以穷其枝叶。

隋唐一统，儒学也复归统一。唐太宗贞观年间，孔颖达、贾公彦等奉诏修纂《五经正义》以义疏的形式，广采博稽，南学（玄学）北学（汉经学），熔为一炉。从此百十年间，士子为学，官府铨选，有了统一的尺度，儒学遂在固定的范式中，行使其塑造中国文化的职能。传统“汉学”的种种分歧和争端，也在这里作了总结。

宋明理学是儒学的又一变种，它统治中国意识形态的时间也最长。理学的开端，可追溯于唐中叶。那时，在唐王朝“三教并重”政策鼓励下，儒、释、道三道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并逐渐形成一种合一的趋势。韩愈等出于对异教的排斥，倡为“性命”、“道统”之传。至宋代，理学家们便打着复兴儒家道统

目 录

至圣先师	孔 子		(1)
儒家亚圣	孟 子		(42)
战国名儒	荀 子		(61)
公羊大师	董仲舒		(83)
儒林异军	刘 歆		(120)
盛世鸿儒	孔颖达		(142)
关学领袖	张 载		(163)
理学大师	朱 熹		(180)
经学畸人	廖 平		(209)
现代圣人	梁漱溟		(231)

至圣先师

孔 子

(前 551 年—前 479 年)

曲阜，东临蒙山，北靠东岱，南阻峯山，西绕沂泗，那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天然粮仓，因而很早就成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早在公元前四千多年，这里便出现了“大汶口文化”等原始文明。稍后这里又是传说中古帝少昊氏定都之处，号称“少昊之墟”。历夏经商，曲阜又成为鲁周公封国的首都，肩负起镇抚东夷，拱卫王室的历史重任。在春秋时期，曲阜以其所保存的西周礼乐资料，逐渐成为中国文化造型的摇篮。利用这些丰富的历史积淀，完成这种造型工程的总设计师，便是世界文化名人、儒学宗师——孔子。

一、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

孔子，名丘，字仲尼。他是商王族微子启的后裔。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武王伐纣，取商而代之；继而周公东征，封微子启于宋（都今河南商丘）。五传至于弗父何，礼让其国于弟弟宋厉公，自己则成为宗国大夫。弗父何便是孔子这一支的第十世先祖。从此，以历公一系掌握了宋国君权，维系着并不出色的世

袭统治；而弗父何一系则成为宋国辅政的公族，同时，也保持着宋国高水平的文化素养。又三传至正考父，更以知书识礼之谦谦君子的形象知名后世。他熟悉祖先商人的文献，曾校“商之名颂”于周太史氏。在接受君主的委命时，正考父始而俯首，再而倮背，三而弯腰，颓躬如也。据传他连走路也靠墙而行，不与任何人发生争执和不快。但传至其子孔父嘉时，情况却大为恶化。嘉为宋懿公大司马，“十年而十一战”，民怨沸腾。偏偏孔父嘉的政敌太宰督一次在途中遇上了他那年轻美貌的妻子，痴痴地“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于是利用国人对孔父嘉的不满情绪，发动政变将孔父嘉杀死，宋懿公出面干涉，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太宰督纳其妻而逐其子，从此结束了孔子祖先们世为宋大夫的贵族生涯。孔父嘉之子木金父逃难来到鲁国，卜居于曲阜城东昌平乡之阚邑。子孙从此袭姓孔氏，世为鲁人。心有余悸的孔氏子孙，在鲁国隐姓埋名，四世皆不显，一直到孔子父亲叔梁纥，才稍有事迹见载于史籍。

叔梁纥是个武士。叔梁是字，纥是名，称叔梁纥是对他的尊称。他曾长于阚邑，又称阚人纥，或叫阚叔纥。叔梁纥腰圆体壮，膂力过人。他作为鲁大夫孟献子的武士，时常参加战斗，颇以勇武闻名。公元前563年，叔梁纥参加了讨伐偃阳的诸侯联军。偃阳是个附庸小国，但却长于诡计。当诸侯联军兵临城下时，偃阳人大开城门，受降。诸侯联军不知是计，猥然争入城门，军入方半，那悬起的城门突然降落，联军有被拦腰断，各个击破的危险。叔梁纥见势不妙，一个箭步冲上去，双手托住千斤城门，使联军得以迅速撤出，避免了重大的损失。七年后，叔梁纥与大夫臧孙纥同守防邑，不料被齐国的侵略军团团围困，兵力悬殊，一连数天动弹不得。一天夜里，叔梁纥侦察好敌情，

然后挑选精壮三百，披坚执锐，乘间突围，将臧孙纥送出重围。然后又神不知鬼不觉地重返防邑坚守。一往一来，如入无人之境。叔梁纥有谋有勇。遂以武功知名诸侯。被升任为郕邑大夫。终于向久违了的贵族集团迈进了一大步。

叔梁纥的家庭生活却不太如意，他先娶施氏，连生九子，都是千金；再娶一妾，生子孟皮，又是个跛子。象叔梁纥这样已有些身份的武士、大夫，总该有个象样的继承人，以便先人们香火有后，也可望重振家业。于是，尽管已到了六十余岁的翩翩老矣之年，仍然振着精神向颜氏求婚。颜氏是曲阜城内的大族，家有三女，老大老二都不同意嫁给这位哪怕是英雄的老人，唯有老三徵在答应了他，并很快有了身孕。十月大期。产下一男，便是孔子。新生儿头顶有个内凹的圩顶，类似阿丘；生前孔子父母曾祈祷于尼山，因字仲尼。

叔梁纥如愿以偿地得到了个胖儿子，但天不假年，他来不及把孔丘培养成人，便的爱子三岁时溘然长逝了。对小仲尼全部的哺育教养义务一齐落在这位身份未明的年轻妈妈的肩头。为了避免叔梁纥那个多子女、多妻妾的家庭矛盾，徵在离开了孔家，带着小仲尼定居曲阜城内阙里。生活是非常艰苦的，孔子小小年纪也不得不帮助母亲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他后来曾经说过：“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就是指这一时期的艰苦生活。但是，孔母徵在并没因生活的艰难而忽视对孔子的文化教育。曲阜，是鲁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又是周公之子伯禽的封国，西周的礼乐文献保存殊多，邻国赞叹它说：“周礼尽在鲁矣”！鲁国素有礼义之邦的美名。孔母选择曲阜城定居，其用意也许还在于利用这里的文化气氛以教育孔子。孔子儿时，孔母徵在给他一些礼乐之器作玩具，使之从小便接受礼乐文

化的感性教育。《史记》说：“孔子为儿嬉戏，设俎豆，陈礼容。”即指其事。俎为圆形礼器，豆为方形礼器。生活中的耳濡目染，使孔子对礼乐文化愈来愈感兴趣，到15岁时，他已是留连礼乐，乐以忘返了，立志要对这种文化进行深入细致的学习和研究。到17岁时，孔子已学得彬彬有礼，在等级森严的贵族社会中，获得了“知礼”的赞许。这时，孔子的身体也发育成熟，身長九尺（合今1.91米），堂堂伟丈夫，号为“长人”。气力大得惊人，一如乃父。含辛茹苦的孔母微在看在眼里，喜在心上，自己十多年来的苦与乐、忧与思都以儿子的长大成人得到了满意的报答。想到孔丘有成，孔门有后，一股欣慰的甘泉滋润着她那久已枯竭的心田。然而，她同样未能看到儿子大有作为，便带着一个年轻寡妇固有的哀思与凄凉，离开了这个对她来说是苦多于乐的世界。

孔子三岁丧父，十七丧母，从此他失去了亲人的庇护。孤伶伶独身一人跨入了那个动荡的人生旅程。在这个旅程中，孔子遇到的第一件事就十分麻烦，那就是如何安葬亡母之遗体。按照“生同室、死同穴”的习惯，孔子应该将亡母与亡父合葬；更重要的是，这也是一个肯定徵在与叔梁纥合法夫妻关系的时机。可惜的是，孔母微在从来未向孔子谈起过叔梁纥，更没告诉他叔梁纥的墓地。在注重礼乐教化，强调孝行的鲁国社会，这实在是件费解的事。《史记》只含糊地说：“盖讳之也。”至于为何讳之，可能只有从孔子出生的情形和徵在的身份去找答案。孔子心生一计，将亡母灵柩殓于当时曲阜车来人往的大道——“五于之衢”，借以引起人们的关注。果然一个赶车人的母亲，她熟悉叔梁纥和徵在的事情，将叔梁纥的墓地告诉了孔子，孔子于是得以将亡母与叔梁纥合葬于防山，即今梁公林。

真是两全其美，既肯定了叔梁纥与微在的夫妻关系，尽了他孔子的一点孝道，也确定了自己与叔梁纥的父子关系，叔梁纥那士人的头衔和勇武的名气正是他希望步入贵族社会有用的阶梯。

二、学道不厌 诲人不倦

安葬亡母的得意之举，着实让孔子兴奋了一阵，当季氏家举行“飨礼”时，孔子便戴着母孝亟亟前去赴会了，不料吃了闭门羹。飨礼，是一种招待士人的饮宴制度。士人们定期聚在一起，借着宴席乐歌，演习礼仪，以文会友，切磋技艺。统治者则可以利用这一“优贤礼士”的形式来联系感情，笼络士人。孔子也许是出于前一个目的，出于对礼乐的爱好，急忙赶来参与这一盛会，以便见见世面，长长见识。却被季氏的家臣阳虎（又称阳货）挡在门外，还酸溜溜地说：“季氏宴请士人，并不敢请先生您呀！”当时，整个社会分成若干等级，诸侯国君分成公、侯、伯、子、男五等；臣子又分成卿、大夫、士三等，再以下便是庶人、工商、皂隶了。只有士以上才是有爵位有身份的人，要进入上层社会，必须首先取得士的资格。孔子本来通过葬母于防肯定了自己与叔梁纥的父子关系，根据“士之子孙恒为士”的规矩，他自认为应当已取得了士的资格了，不意并未得到社会的承认。在这套森严的等级面前，孔子并没有不满，更不会反抗，他生性不会怪罪别人，总认为：“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己之不能也”；“不患无位，患所以立。”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孔子总是强调自己的时候多，责怪别人的时候少。他说：“君子求诸己，小人责诸人。”对阳虎的闭门羹，他不怨天，不尤人，平静地退了下来。此后他努力提高自己，加强修养，让人理解，以适

应等级社会的种种要求，他希望通过“庶人在官”的途径挤入贵族集团。他曾自述其为学历程说：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

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即是说，他孔子 15 岁时树立了系统学习礼乐文化的志向；30 岁已具备了立身上流社会的全套本领；40 岁时已是信心坚定，认识准确，没有任何东西让他迷惑；50 岁时他进而参验到了带规律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道理；60 岁时能够对一切耳闻目睹的事情作出迅速而准确的反映；70 岁后，孔子的言行达到了一种与客观规律和行为准则的高度统一。这就是孔子从一个不被社会理解和接受的青年成长为圣人，在认识和修养上的渐进过程。

当时，贵族阶级要求全面掌握的知识和技能有六种，即礼、乐、射、御、书、数，称之“六艺”。“六艺”是古人关于“德、智、体”三方面内容的教育。《周礼》说：“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国子，即贵族子弟。国家有专职人员保氏用六艺来教育贵族子弟，为维系贵族的世袭统治培养人材。这大概是西周时期的情形。到了礼坏乐崩的春秋时代，贵族子弟多膏粱世胄，锦衣玉食，并不都是掌握了“六艺”才从政，而是在从政后为工作所迫不得不学点知识。那样，一来可以使他们获得统治人民在世袭权力以外的真本事和真权威，二来也可以博得“敦诗书、说礼乐”的美名。但是作为平民子弟，要想进入上流社会，却必须首先学会六艺。这样情形就是孔子所说的：“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先进于礼乐，小人也。”子夏所谓“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也是此意。作为白身布衣的孔子，要想得到贵族社会的接受，当然只有走“先进于礼乐”、“学而优则

仕”的“小人”所走的道路了，所以他说：“若用之，吾则从先进。”

孔子以“君子谋道不谋食”自勉，他“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这样不讲享受，唯道是谋的精神，在当时的鲁国是独一无二的。他曾自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学也。”在那时，根本没有完全意义的教育，一无学校，二无教材，三无教师。但孔子随时作求知的有心人，谦逊好学，随时吸取哪怕是点滴的营养来滋润自己那渴求知识的心田。他推崇“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在他眼里，处处有学问，人人可以为师。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不善者而改之。”在任何一群人中，都有值得自己学习的老师，只要留意就可得到教益；即使是不善的言行，也可从反面受到启发。他的弟子子贡说：“仲尼无所不学，无所不师。”他曾学琴于师襄，学古少昊之职官于郯子，学乐于弘荑，相传孔子还向比自己小得多的项橐请过教，此即“孔子师项橐”的嘉话。他“入太庙，每事问”，有人不理解说：“孰谓甌人之子礼乎？进太庙，每事问。”孔子回答说：“这就是知礼呀。”知道自己无知并积极求知的人就是最聪明的人。“文武之道未坠于地，贤者识其大者，不肖者识其小者”，每个人只要善于学习，即可滴水成流，积流成河。

孔子好学，亦复善思。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主张学思结合。《中庸》篇还记载孔子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问、思、辨、行、是孔子归纳的从求知到实践的重要环节。其中“学”和“问”是广泛地吸收信息，产生感性认识的阶段；“思”和“辨”是对信息进行思考、包括归纳、分析、推理、演绎等思维过程，产生理性认识的阶段；

“行”则是将认识贯彻到实践中去的阶段。孔子本人就是与思相结合的典范，他从来不满足于知其然，必定要知其所以然，而且还常常从平常的事物中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和真理。

孔子曾从师襄学琴，一个曲子弹了十日，本已十分熟练了，师襄说：“可以学新曲子了。”孔子说：“我虽学会了曲子本身，还没学会演奏技巧。”又过了十日，师襄说：“技巧已学会了，可以学新曲了。”孔子却说：“我还未能表现曲子的主题思想。”等主题思想已演奏出来，他还不肯学新的，说：“我未能想见作曲者的为人。”又过了十日，突然有一天，他肃穆地深思着，兴奋地远眺着，意味深长地说：“我得其为人矣！其为人也，黯然而思，欣然远视，眼波深邃，仿佛是君临天下的天子！这不是周文王吗！”师襄一听，连忙离席再拜，连连称是说：“对呀对呀！我老师传授时就说是《文王操》。”

一次，孔子到鲁桓公庙观礼，发现一个歪倒着的瓦罐，守庙人告诉他那是“佑座之器”——欹器。孔子听后说：“吾闻佑座器者，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命人注水，果然如此。然后感慨万端地说：“安有满而不覆的呢！”于是 he 从这个满则覆的规律提出了正确的处世态度：“聪明圣智之人，要保持礼让精神；武力征服天下之人，要保持敬畏心理；富有四海的人，要保持谦逊的态度。”

孔子好学深思，很快就在知识上和修养上丰富起来了，他的声名也很快传到贵族们耳里，甚至国君也注意到了他。孔子十九岁娶妻，二十岁得子，鲁昭公知道后，赐给双鲤矜尝。这样就使他有更多的机会与贵族和官方接触，也就有可能更多地阅读到鲁国宫室保存的文献资料。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光靠

鲁国所有的文献是不够的，还必须走出去扩大视野。于是孔子把注意力首先投向了夏、殷后裔之国的杞和宋。《论语·八佾》记孔子说：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不矣。

为了考察夏殷礼制，孔子曾亲临杞宋两国，获得过《夏时》和《坤乾》等文献资料。《夏时》，即夏代观象授时的历书；《坤乾》，论者以为是殷易《归藏》，属于占筮和哲理书。可惜反映夏殷之礼不多，收获远不是孔子希望的那样大。但是，孔子为观周礼而作的洛阳之行，却让他大喜过望。终生受益非浅。

史载孔子早年以“知礼”名于贵族社会后，孟僖子临死时将两个儿子孟懿子和南宫括送到孔子处学礼。后来这两个贵族子弟向鲁昭公进言，请求资助孔子前往洛阳考察周礼，昭公给车一辆、马两匹和僮仆两个。洛阳，营建于西周初年，公元前770年正式成为东周的都城，至孔子造访时，洛阳为都已达200余年了，那里文物荟萃，档案丰富，是周朝数百年衣冠文物的聚集之地。孔子来到这个天下共主周天子的都城，目睹这里琳琅满目的文献文物，仿佛当年西周强盛的面貌就展现在眼前，遂由衷地赞叹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由此立下了他追求周礼的信念。据说孔子在这次访问中还见到过当时中国另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老子。老子，名聃，楚人，当时正作周藏室史（国家图书馆馆长），与孔子积极求知和汲汲救世的精神相反，老子对当时江河日下的社会彻底地失望了，抱的是无为无欲、绝圣弃智的哲学，他年纪比孔子为长，在孔子告别洛阳时，曾语重心重地告诫孔子，说：“富贵者赠人以财，仁人者赠人以言。我不能富贵，姑且冒充仁人送你几句话。你好古敏

求，这是好事，但切不可照搬古代。世上有的人，虽然聪明深察，却往往难免钺斧之诛，那是好议人非也；虽然博辩宏大，却不能保全首领，那是好发人之恶也。身为人子不可自私，身为人臣也不可自私。”这番话对后来孔子“信而好古”而不泥古的风格、“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的君子风采以及奋身救世的精神的形成，无疑是有帮助的。难怪他要感慨万端地说：“世界万物中，只有龙，乘风云而上天，千变万化不可捉摸，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耶！”

功夫不负有心人。孔子很快就娴熟地掌握了“六艺”的全套本领。他于射，技高艺深，曾“射于罍相之圃”，引得“观者如堵墙”。于御，更是他常常自夸的看家本领。曾有“达巷之党人”称赞他说：“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孔子听了谦逊地说：“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可见孔子对执御还是十分自信的。于数，孔子也是烂熟于脑，为后来他作季氏史，做到帐目清楚，收支平衡（“料量平”）准备了条件。于书，更是知识分子的基本功。对于礼乐，则是孔子兢兢以求，并终生乐此不倦的专长。礼乐包括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在孔子以前有人将它分成礼和仪（又称数），并出现了只重形式（“仪”、“数”）不内重容（“礼”的倾向。任何一种制度设施、行为规范都是在特定的精神和原则指导下制定和形成的，每一形式都包含着一定的内容。礼乐也如此，它的产生最早可追溯到原始人那里，许多礼节都有象征意义，这就是原始人的礼乐内容。到了奴隶社会，统治者从诸多的原始礼节中挑选出有用的部分，给它们赋予新的含义，推行开来以维护自己的统治，从而形成奴隶社会的礼乐内容。根据中国奴隶社会的特点，礼制、即礼乐制度，是奴隶主阶级实现其对奴隶的统治的根本依据，礼乐